

从族际沟通到族际冲突

——“3·11 宣言”前后伊拉克复兴党与 库尔德人的族际政治交往*

韩志斌**

内容提要 1970 年的“3·11 宣言”表明，伊拉克复兴党在库尔德民族问题上倾向于以自治为轴心，通过转让部分政治权力，保障族际平等和族际沟通，缓解族际之间的紧张关系，以赢得库尔德人的政治支持，实现国家整合的族际政治。“3·11 宣言”的成败历程，展示了伊拉克复兴党和库尔德人从族际沟通到族际冲突的族际政治交往流变。“3·11 宣言”失败是来自族际接触过程中伊拉克库尔德人对民族地位不平等以及利益分享不公平的觉察和反应，表明了库尔德人追求民族国家均质化的理想，以及由此产生的具有排斥性的政治认同和建立在这种政治认同基础上的社会心理。

关键词 伊拉克复兴党 库尔德人 “3·11 宣言”

族际政治研究是世界史研究的崭新题域，它是关于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政治建构、政治决策与实践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多角度地构建族际交往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话语体系。伊拉克复兴党与库尔德民族的族际冲突一直是中东族际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中东热点问题之一。国内相关研究成果重点关注二者的族际冲突，鲜有提及二者族际沟通的学术成果。实际上，伊拉克复兴党与库尔德人曾在 1970 年签署了“3·11 宣言”，这是二者族际沟通的重要事件。克里姆不无遗憾地指出，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热点问题与联合国研究”（项目编号：12JJD810009）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 2012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ECT-12-1050）和“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计划”的资助。

** 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如果“3·11 宣言”得以实施的话,那么随后伊拉克复兴党政府与库尔德人的一系列冲突就可以避免。^①但国内相关成果或没有提及此事,或语焉不详。国外已经有一些相关成果,但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得出的结果有失公允。^②本文试图从族际政治交往的理论视野出发,深入细致地阐述“3·11 宣言”前后伊拉克复兴党与库尔德人从族际沟通到族际冲突的族际政治交往流变,探讨“3·11 宣言”失败的根源和后果,从而弥补国内学术界对相关命题的忽视。

—

伊拉克复兴党与境内的库尔德民族问题既是伊拉克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互动关系,也是伊拉克境内的阿拉伯主体民族(阿拉伯民族)与少数民族(库尔德人)之间的族际政治交往。从理论形态来说,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与库尔德民族主义都具有复杂多样的内容与形式,其主旨都是力图维护本民族的政治利益。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政治民族主义目标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二是在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政治格局中占有并维持对本民族发展较为有利的地位与权力。^③对于复兴党居于伊拉克统治地位的库尔德民族来说,前一目标已经很不现实,而后一目标显得更为实际。

对于伊拉克复兴党来说,争取与拉拢库尔德人是伊拉克国家构建的关键。1970 年的“3·11 宣言”表明伊拉克复兴党想彻底解决库尔德民族问

① Kerim Yildiz, *The Kurds in Iraq: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Edition, Pluto Press, 2007, p. 18.

② 国内相关成果参见敏敬《伊拉克库尔德自治的最新发展与影响》,《国际论坛》2011 年第 1 期;田宗会《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的新变化及前景》,《世界民族》2010 年第 4 期;蒋春馥《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为何久拖不决》,《当代世界》1996 年第 11 期;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商务印书馆,2002;刘月琴编著《伊拉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等等。国外相关成果参见 D. Ronen, *The Quest for Self-determin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I. B. Tauris, 2004;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Kerim Yildiz, *The Kurds in Iraq: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Edition, Pluto Press, 2007; Michael M. Gunter, *The Kurds in Iraq*, St. Martin's Press, 1992; Middle East watch, *Genocide in Iraq: The Anfal Campaign Against the Kurds*, Human Rights Watch, 1993.

③ 王建娥、陈建樾《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 47 页。

题。第一，复兴党领导层意识到不解决与库尔德民族的族际冲突，就不能建立一个稳定、受民众欢迎的政府。第二，解决库尔德民族问题可以证明复兴党对待少数民族的基本理念与态度。1970年的“3·11宣言”不仅仅是解决双方冲突的权宜之计，其目的是解决旷日持久的库尔德民族问题。第三，复兴党认为，解决库尔德民族问题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前提。只有解决了库尔德民族问题，伊拉克复兴党政府才可以腾出力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四，在复兴党民族主义者看来，库尔德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问题。复兴党认为1968年的“7月17日革命”不能剥夺“库尔德人的合法权利”。第五，复兴党强调了阿拉伯-库尔德民族兄弟关系的历史意义，认为反对库尔德民族的政府也不会赢得民众的认同，更难生存下去。第六，在民族国家构建问题上，复兴党认为阿拉伯民族与库尔德民族有着不同的政治命运。阿拉伯民族拥有自己的一系列国家，而库尔德民族被分割在若干国家，解决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方法是满足库尔德民族的合法诉求。^①

在族际政治特别是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博弈中，族际沟通是能够获得最优博弈结果的可选择策略之一。库尔德民族表现出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根深蒂固的强大力量，威胁到伊拉克的民族国家建构与社会秩序重建。如果不与库尔德人进行多通道的族际沟通，就不可能解决库尔德民族问题，更遑论进行经济与社会改革。1971年，伊拉克某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复兴党与库尔德人发生族际冲突，会带来以下不利后果：西方国家会借机破坏二者的关系；伊拉克军队将在冲突中被削弱，有碍复兴党完成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大业；伊拉克经济会因与库尔德民族发动战争而一蹶不振，破坏伊拉克农业、交通等基础设施，阻碍生产建设的顺利开展，造成走私囤积现象严重，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不得不加入军队，军费将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沉重负累；伊拉克少数民族会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是种族主义，忽视少数民族的利益；削弱伊拉克的经济自主能力；独立的伊拉克将处于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敌对力量的困扰之中。^② 文章所论及的上述威胁以及复兴党民族主义本身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签署“3·11宣言”的基础。

^①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92-95.

^②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83.

1969 年,伊拉克总统贝克尔在“7 月 17 日革命”周年纪念大会上宣布,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决定“和平、民主地解决库尔德民族问题,反对沙文主义与分离主义,制止帝国主义与反动力量的干预”。^① 1969 年末,《复兴党报》发表了题为“如何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文章,阐释了伊拉克复兴党解决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复兴党承认库尔德民族是一个被国际边界线分割的跨界民族。文章认为伊拉克库尔德人伸张民族个性必须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统一起来,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的合作与协商是双方良性交往的出路。

当然,以色列与伊朗的外部挑战也是伊拉克复兴党如此决策的原因。在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理念中,以色列、伊朗是阿拉伯世界的罪魁祸首。伊朗对海湾地区一直垂涎三尺,而以色列则希望伊拉克复兴党与库尔德人纠缠不清。1969 年 2 月,伊朗支持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目的是推翻复兴党政权。^② 此外,伊拉克复兴党当时还没有控制军队,保守派还控制着军队中的要职,与库尔德人协商也是为复兴党扎稳政权打基础。

伊拉克复兴党政治精英意识到:目前的族际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结果不确定的博弈行为。在加强族际沟通基础上,协调、整合民族利益并寻求最优化策略,尽管难以达到最优化的结果,但却易达成“没有输家”的最佳博弈结果。这一切使得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无法漠视族际沟通(谈判与协商)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伊拉克复兴党在库尔德民族问题上倾向于以自治为轴心,通过转让部分政治权力与制度构建,保障族际平等和族际沟通,缓减族际之间的紧张关系,以赢得库尔德人的政治支持,实现国家整合的族际政治。也就是说,复兴党政府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库尔德问题,这就是 1970 年“3·11 宣言”出台的基本背景。

二

1969 年末,复兴党与库尔德各派系之间开始了非正式谈判。1970 年 3 月 1 日到 10 日,双方讨论了“库尔德民族在伊拉克的合法诉求”,协商结

^①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81.

^②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1970.

果是同意“在自治与伊拉克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民主、和平地解决库尔德民族问题”。^① 最终，伊拉克复兴党与巴尔扎尼为首的库尔德民主党签署了合作协议，这就是“3·11宣言”。

1970年3月11日，贝克尔宣布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将按照复兴党第七次地区代表会议的决定，和平解决库尔德民族问题。大会界定了复兴党在库尔德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内容包括：库尔德语为库尔德地区官方语言，与阿拉伯语同为学校教学用语；库尔德人参与政治管理，担任政府要职；促进库尔德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库尔德地区成立学生团体、青年组织、妇女协会与教师代表大会；库尔德人回归农庄并给予补偿；库尔德地区实行土地改革；修改宪法，规定伊拉克人包括阿拉伯民族与库尔德民族；库尔德地区的秘密电台与重武器交付复兴党政府；发展库尔德地区经济；任命库尔德人为副总统；按照“3·11宣言”修改行省法；库尔德地区为自治区。

伊拉克复兴党政府采取措施落实“3·11宣言”中承诺给库尔德人的权利，这些措施包括：认同库尔德民族主义；成立苏莱曼尼亚大学；学校中讲授库尔德语；认定新年^②为国家法定节日；颁布《库尔德地区自治法》，强调分权原则；成立包括摩苏尔在内的，以库尔德人为主的杜胡克（Duhok）省；大赦参与叛乱的库尔德人。

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巴尔扎尼对“3·11宣言”给予库尔德人的自决权较为满意。他表示要忘记昔日与复兴党的宿怨，支持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库尔德人称自己是复兴党的可靠盟友。^③ 库尔德人接受1970年“3·11宣言”有以下原因。

第一，自1961年以来，库尔德人在与复兴党政府军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厌战情绪严重。伤亡人数多达6万人，3000多库尔德人村庄被毁。^④

第二，库尔德内部各派系都想与复兴党政府达成协议。就库尔德人内部来说，除亲复兴党的塔利巴尼——艾哈迈德派系外，一些亲巴尔扎尼的激进成员也希望与复兴党达成协议。这些人希望复兴党能够改变封建主义、

①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86.

② 新年英文为 Nawwuz，这是扎格罗斯（zagros）人与伊朗高原人庆祝的传统节日。

③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70.

④ “Memorandum on the Kurdish Question,” *Kurdish Journal*, 6, No., March 1969, pp. 37-40.

宗派主义、部族主义力量主导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格局。

第三,巴尔扎尼感到复兴党政府的政治压力。库尔德民主党主要人物,巴尔扎尼的支持者巴巴卡尔·马哈茂德·皮斯达利(Babakr Mahmud Pishdari)认为,复兴党政府的政治压力及其保证库尔德人享有政治、经济与文化权利的许诺是库尔德人接受宣言的原因。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巴尔扎尼及其支持者对复兴党政府与塔利巴尼派系的亲密关系心存余悸;二是巴尔扎尼对伊朗的支持持怀疑态度;三是宣言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巴尔扎尼的目标,如允许库尔德自治,巩固巴尔扎尼在库尔德地区的权威等。

在“3·11宣言”颁布的一个月之内,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就组成了一个高级委员会,包括4个阿拉伯人,4个库尔德人。该委员会的职责就是推进“3·11宣言”各项规定与条款的顺利进行。

(1) 改组政府。按照宣言要求,5名库尔德民主党政治局成员被任命为部长职位。按照“3·11宣言”的规定,库尔德人担任库尔德地区总督、副总督以及地区领导。4名库尔德人被任命为副总督职位,39名库尔德人被任命为地区领导。复兴党政府还任命3名库尔德人为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与杜胡克地区的警察局长,许多库尔德人成为市镇头脑。1970年4月23日,两名库尔德人被任命为驻外大使。4月25日,一名库尔德人担任文化与信息部部长。

(2) 库尔德地区使用库尔德语。1970年4月末,伊拉克教育部宣布库尔德语为库尔德地区中小学授课语言,也是该地区报纸、杂志的出版语言。革命指挥委员会还命令各部门采取措施修缮库尔德公共住房,赦免参与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学生。

(3) 库尔德地区成立库尔德民族组织。复兴党允许库尔德各省份成立库尔德学生、妇女与教师联盟,公务员、官员与军人各司其职,重新上任。伊拉克成立了库尔德作家联盟与库尔德文化社团等机构。

(4) 恢复库尔德地区的基础设施。复兴党政府拨付1100万伊拉克第纳尔修复在战火中毁坏的100座库尔德人村庄。复兴党政府在库尔德地区投巨资建设交通、通信与电力项目。为刺激旅游业,改善民众娱乐生活,复兴党筹措资金修缮毁于战火的旅馆、营地以及电影院。

(5) 加速库尔德地区土地改革的步伐。苏莱曼尼亚等省份的土地在取消补缴税款的基础上分配给农民。埃尔比勒省开挖自流井,用于饮用和田

地灌溉。

(6) 修改临时宪法，强调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1970年7月16日，伊拉克政府决定修改临时宪法。修改后的宪法强调了“伊拉克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伊拉克民族由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两大民族构成”，“在库尔德地区，库尔德语与阿拉伯语均为官方语言”。宪法还强调“不管其种族、肤色、语言、社会出身或宗教信仰，伊拉克人在宪法面前人人平等。”^①

通过以上措施，库尔德人与复兴党政府的族际交往出现了和谐的局面。1970年7月，来自叙利亚、伊朗的库尔德代表，伊拉克复兴党政府代表、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在靠近伊朗、土耳其的边陲小镇卡拉拉（Kallala）举行会议。在库尔德民主党秘密会议上，巴尔扎尼被选举为库尔德民主党主席。随后，他以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名义号召库尔德人与复兴党政府合作。会议肯定了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的兄弟情谊，库尔德人宣布支持复兴党政府。

1970年11月，库尔德人通过国民大会参与立法进程，成员包括库尔德人与阿拉伯民众组织等进步与爱国人士。库尔德民主党宣布国民大会是临时机构，下一步就是自由选举，草拟永久宪法。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允诺吸收6000名库尔德自由斗士组织（pesh Mergas）成员充实边防，库尔德军队可以拥有武器，复兴党政府拨给库尔德地区9万伊拉克第纳尔作为军饷。巴尔扎尼每月享受3.5万到5万伊拉克第纳尔的政府薪金。^②

“3·11”宣言的第一年是库尔德人与复兴党政府的蜜月期。尽管复兴党政府财政紧张，但库尔德地区的医院、学校的修建工程照常进行，1700间房屋得以修缮。埃尔比勒总督阿特鲁斯（Atrushi）宣布战火毁坏的100所村庄已经修复一半。库尔德人与复兴党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1971年初。1970年11月，巴尔扎尼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目前双方合作前景是乐观的，……伊拉克复兴党政府许诺在明年三月让我们自治。迄今为止，他们信守诺言，执行协议。我们想与政府合作下去。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后，双方都体会到和平与安全的珍贵。尽管我现在没有感觉到绝对的安全，但这一天会到来的。”^③复兴党方面也表现了乐观的情绪，萨达姆认

①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01

②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02

③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3, 1970.

为库尔德民族问题的解决可以保证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兄弟友谊。^①

三

复兴党与库尔德人从族际交往到族际冲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先后经历了表面友好时期（1970～1972）、相互攻讦时期（1972～1974）、武力冲突与外交博弈时期（1974～1975）。^② 其最大特点就是冲突与协商一直形影相随，最终兵戎相见，宣告了“3·11 宣言”的失败。

民族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人类行为和选择的结构。追逐个体或小集团的民族精英们为争夺资源所进行的努力是族际冲突的内在驱动力。^③ 而伊拉克复兴党与库尔德人在社会稀缺性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方面具有不同的利益指向，或者说掌握政治权力的复兴党主体民族从利己主义出发分配国家资源的做法，受到库尔德人的强烈质疑与挑战。也就是说，当国家、领袖与制度无法为公民创造出满意的环境，当恐惧与失望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人们转而从各自的民族寻求自我保护，民族间的信任从此瓦解，族际冲突就不可避免，这也是“3·11 宣言”失败的根本原因。伊拉克复兴党与库尔德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层面。

第一，在政治地理层面，复兴党政府难以将库尔德民族地域进行精准定位。领土、主权和民族主义紧密结合的价值体系，深深地嵌入了伊拉克复兴党与库尔德人族际交往的行为之中。按照“3·11 宣言”，复兴党政府应该在 1970 年 12 月就开始对库尔德地区的人口进行普查，但直到 1971 年春，还没有启动这一项目。该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意义重大，复兴党政府许诺库尔德人数占多数地区可以自治。复兴党认为是埃尔比勒、杜胡克与苏莱曼尼亚省的库尔德人占多数，库尔德人认为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石油资源丰富的基尔库克地区。复兴党政府认为基尔库克地区居民成分复杂，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不能划为库尔德人自治区。土库曼人与库尔德人一直不和，因此前者也不愿被纳入库尔德自治区。库尔

^①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1970.

^② 详细内容参见韩志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 137～142 页。

^③ 关凯：《族群政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第 75 页。

德人指责复兴党政府向库尔德地区移民影响了人口调查结果，巴尔扎尼认为复兴党政府给泰（Tay）、舍迈尔（Shammar）、乌拜德（Ubayd）、拉特巴（Ratba）、拉马迪（Ramadi）的贝都因部族颁发了身份证，试图让基尔库克、辛加尔（Sinjar）地区阿拉伯化。^① 以上指控被复兴党逐一否决。萨达姆指出，人口调查以1965年、1957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依据。伊朗库尔德人居住在伊拉克，但并没有伊拉克公民的合法地位。库尔德人想将该地区居民纳入库尔德人口普查，而复兴党政府则坚决反对，担心库尔德人通过吸纳伊朗、土耳其库尔德人而使基尔库克人口结构剧变，威胁国家稳定。

第二，在政治架构层面，复兴党政府难以将国家治理化约为国家内部各行为体的利益分享，与库尔德人在许多方面存在矛盾。复兴党想与伊拉克共产党合作，库尔德各党派反对与伊拉克共产党合作。库尔德人要求撤退库尔德地区的复兴党政府军，遭到拒绝。二者在自治与独立的区别问题上也不一致。萨达姆强调了自治并不意味着独立，宪法保证“3·11宣言”中所规定的少数民族的权利。他说，只要伊拉克不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并，复兴党肯定会承认库尔德民族的自治地位。^② 1972年6月，伊拉克实行石油国有化政策，雅兹迪（Yazidi）库尔德人发动起义，原因是石油国有化政策减少了他们的收入。复兴党政府动用空军平息起义，各方伤亡30~50人。

第三，在行政效能层面，库尔德人强调自治边际的最大化，而复兴党的做法则与之相反。这一点在《自治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74年3月11日，贝克尔总统宣布革命指挥委员会将在库尔德地区执行《自治法》，他宣布这些法律的执行依据是“3·11宣言”与民族行动宪章。《自治法》规定，库尔德自治区是伊拉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自治区机构的权利受到复兴党中央政府的严格限制，政府与自治实体之间是监督与协调的关系。族际差异和利益诉求的多样以及外部力量的干预（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支持），使得库尔德民族拒绝《自治法》，直接挑战复兴党的政治合法性。库尔德人所主张的自治限度与复兴党政府所要求与理解的自治概念并不一致，前者的内涵远远超出后者的底线与忍耐程度。此外，复兴党政府反对库尔德人拥有富油的基尔库克，令后者耿耿于怀。^③

①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06

②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13.

③ *Financial Times*, March 28, 1974.

内部资源的壮大或外来力量的切入也是库尔德民族挑战伊拉克复兴党既有的秩序和权威的重要因素。库尔德人的外来力量有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据可靠资料显示,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援助始于 1969 年 8 月,巴尔扎尼曾得到美国 14 万美元的秘密援助。^① 巴尔扎尼在接受采访时说“没有美国的许诺,我们不会贸然行事。”^② 作为对美国援助的报答,巴尔扎尼保证伊朗、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不会独立。^③ 据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高级军官领导人阿齐兹·阿克拉维 (Aziz Aqrawi) 透露,以色列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援助是在 1965 年。以色列前总理贝京也承认为库尔德人游击队提供了“金钱、武器与指导者”,一些军事顾问被派遣到巴尔扎尼的司令部。^④ 与此同时,库尔德地区的武装力量逐渐强大起来,正规军的数目多达 4 万人,军队总人数达到 6 万人。^⑤ 巴尔扎尼还得到库尔德知识分子、一些专家教授的支持,包括 60 个医生,4500 个教师,30 个教授,5000 个警察、160 个工程师以及 100 个军官。^⑥

但情势并没有按照库尔德人的意愿发展。美国和伊朗仅将伊拉克库尔德人看作与伊拉克复兴党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并不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希望“我们的代理人”(巴尔扎尼)不知疲倦地战斗,削弱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力量。^⑦ 1975 年 3 月 6 日,伊朗和伊拉克签订了最终协议,此协议被称为解决两伊问题的最终文本,即《阿尔及尔协议》。^⑧ 《阿尔及尔协议》签署后的几小时之内,伊朗从伊拉克开始撤军,切断对巴尔扎尼的援助。^⑨ 伊拉克复兴党军队对库尔德军队展开反攻。复兴党政府向巴尔扎尼指出三条出路:一是在没有伊朗的支持下血战到底;二是向伊拉克复兴党政府投降;三是移民伊朗。^⑩ 从伊朗回来后的巴尔扎尼致信

①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38.

②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59.

③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1, 1974.

④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ober 6, 1980.

⑤ *Financial Times*, May 1, 1974.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12, 1974.

⑥ *Sunday Times*, May 1, 1974.

⑦ *The Voice*, 11, February, 1976.

⑧ Majid Khadduri, *Socialist Iraq: A Study in Iraqi Politics since 1968*, 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 1978, p151.

⑨ *The Observer*, March 30, 1975.

⑩ Gwynne Roberts, "The Harsh Realities,"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May 1975, p. 15.

复兴党政府要求恢复对话，遭到后者拒绝。3月20~23日，巴尔扎尼召开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会议，决定放弃战斗。^① 巴尔扎尼本人因积劳成疾到美国治疗癌症，从此远离政治。尽管库尔德人失败了，但与伊拉克复兴党的族际冲突并没有结束。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期间，库尔德人一直是反对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有生力量，直到后者被推翻为止。

四

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优势和库尔德人的劣势，决定了“3·11宣言”前后伊拉克族际政治交往的最终结局。

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优势：第一，复兴党通过政治动员，巩固了权威，构建了强大的政治机器，决策有力。第二，复兴党的政策得到了伊拉克民众的广泛支持，即使在巴尔扎尼控制下的伊拉克北部地区也是如此。石油公司的国有化、民族阵线的成立扩大了复兴党的统治基础。第三，伊拉克政府将复兴党意识形态渗透到军队的各个层面，军队成为政府的工具而不是潜在的夺权者。复兴党军队经历了最严格的训练程序，配备先进武器，在镇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中显示威名。第四，石油国有化、油价提升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剧增，国家有资金改善民众生活，增强了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库尔德方面的劣势：第一，库尔德领导人误认为会得到伊朗、美国的持久支持，没想到自己成为两国同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外交博弈时讨价还价的棋子。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了赢得伊拉克复兴党盟友叙利亚支持其中东政策，放弃对库尔德人的支持。伊朗在1975年与伊拉克签署《阿尔及尔协议》后也切断对库尔德人的援助。第二，库尔德人在外国顾问的指导下采取传统的战争方式，忽视了发挥游击战的威力。第三，库尔德领导人的一些政策也不得人心，如阻止土地改革，支持封建地主的特殊利益；与伊共、苏联反目成仇，而此前二者一直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巴尔扎尼不支持土耳其、伊朗的库尔德人政策，疏远了库尔德左派与民族主义者，还将一些领导人或处决，或交给复兴党政府，导致在库尔德地区众叛亲离。

^① *The Guardians*, April 1, 1975.

巴尔扎尼阻止库尔德知识分子与库尔德民主党高级成员参与决策过程。

“3·11 宣言”的失败表明了库尔德人民族主义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具有排斥性的政治认同和建立在这种政治认同基础上的社会心理。强烈而独特的社会经济处境的认知以及建立在民族认同上的社会不满是伊拉克复兴党与库尔德民族族际冲突的必要条件。

从理论上来说,伊拉克复兴党与库尔德人的冲突是两种民族主义的互动交往,不可能在一个政治平台上比肩共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体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①人类与生俱来的群居天性和民族文化的社会功能,使每一个成员对本民族都具有某种自然的内心倾向与认同感,在族体内部内化为紧密的凝聚力、认同感和整合倾向;而在族际交往中则外化为民族至上精神与民族自我中心意识。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过度的民族尊严感和民族至上观念;在行动层面则一般呈现为具有极端自我保护意识的攻击性防御行为,以及在民族生存中不计后果地追求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而在伊拉克境内则表现为:作为主体并已稳固的复兴党民族主义面临着境内一些“次”民族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挑战,这些民族主义运动自然梦想着能褪去这个“次级”的外衣,占据主流。^②由于双方族际沟通在容纳信息流量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度,缺乏多向、多通道的族际沟通网络,因而两股具有不同政治诉求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平台上实现族际整合。

“3·11 宣言”前后伊拉克复兴党与库尔德人从族际沟通到族际冲突的根源,从本质上说来自族际接触的过程中对民族地位不平等以及利益分享不公平的觉察和反应。这种关联首先缘自复兴党追求阿拉伯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其次来自于糅平复兴党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最后是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认同和对他者的排斥意识,以及内化为民族生活的基本特点。

民族自决权本质上是一种后天赋予的政治权利,因而是一种有严格限定条件的权利。正如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所说,民族自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才能使用,在早期未能获得独立主权的

① (英) 安东尼·D. 史密斯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龚维斌、良警宇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第 2 页。

②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吴叡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第 2 页。

民族“错过了历史的公共汽车”，可能再也盼不来下一辆了。^① 在伊拉克主权国家构建以前，其境内的任何民族都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而在主权国家建立后，其国内各个族裔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等于将自己民族自决权利让渡给了层次更高的伊拉克国家主权。这些国内少数民族的集体身份也就由“族裔民族”转变成“政治民族”，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只具有种族和文化意义，而不具有政治和法律含义。对库尔德人来说，伊拉克北部领土对其民族政治主权而言必不可少。面对强势的复兴党政权，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谋求最大程度的自治，成为尊严、满足的标志，民族特性表达的象征，而后者却视之为对伊拉克民族国家的背叛。

① (英) 亚当·罗伯茨 《超越错误的民族自决原则》，载 (英) 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第114~115页。

3. Prospects of Islamic State and its Perceived Menace

Wang Li , Wang Yingliang

Abstract: The US withdrew her troops from Iraq and transformed the security responsibility to Iraqi authorities in 2011. However, due to the inefficienc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poor governance in the area, and the weak authority of Iraqi government, terrorist bodies like “Islamic State” (IS) became a real problem. Specifically, their brutality in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culture and law has shocked the world. Despite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s on IS, the “double-standard policy” and unilateralism,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followed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e US has a responsibility difficult to shirk to this development. Now how can China which has important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the region play a reliable and responsible role in this process? This paper looks back the situation and security dilemma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olds that China has enough ability and wisdom to make contribution to curr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Keywords “Islamic State”; counter-terrorism; geopolitics; ener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 From Ethnic Communication to Ethnic Conflict

— Ethnic Poli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Iraqi Baath Party
and Kurds during Period of “March 11” Declaration

Han Zhibin

Abstract: The “March 11” Declaration in 1970 shows that Iraqi Baath party tended to regard autonomy as the brace on Kurdish ethnic minority issue. A series of measures were taken, including the transferring of the part of the political pow-

er , protecting the ethnic equality and 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alleviating strained inter-ethnic relations , in order to have the political support of Kurds and achieve the ethnic integration as part of national politics.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March 11 ” Declaration also shows the evolvement of ethnic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rom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to ethnic conflicts between Iraqi Baath Party and the Kurds. The failure of the “March 11 ” Declar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feelings and response of the Iraqi Kurds for their unequal ethnic status and unfair interest share felt in the course of ethnic contacts manifests the Kurds’ pursuing the dream of homogenizing in one nation state , and such action led to their political identity of repellency and their social psychology based on such identity.

Keywords: Iraqi Baath Party; Kurds “March 11 ” Declaration

5. China’s Foreign Policy on Iraqi Issues

Liu Zhongmin , Fan Peng

Abstract: The Iraqi issues discussed here include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hot agenda , such as the Iran-Iraq war , the Gulf Crisis , the Gulf War , the Iraq War ,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Iraq , “Islamic State ” and so on. Firstly , China’s policy on Iran-Iraq war mainly includes “to promote peace talks ” unceasingly between the Iraq and Iran , and to persuade both of them prevent superpower intervening. China has been actively supporting and cooperating with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s mediation efforts , and promoting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war under the UN framework. Secondly , China’s foreign policy on Gulf Crisis and Gulf War were composed of several aspects , including continual efforts for peace through persuading Iraq and the sides concerned; and appeal against the Iraqi invasion of Kuwait and great powers intervention in Gulf affairs by force. Thirdly , China’s foreign policy on Iraq War and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Before the war broke out , China tried to solve the Iraq crisis politically under UN framework. During the war , China held her anti-war position , but didn’t participate in anti-war camp , thus embodying a diplomatic art which combined both prin-